

美國之音論壇專集

意識形態與社會變遷

Ideology and Social Change

Alex Inkeles等著
沙亦群譯



意識形態與社會變遷

Ideology and Social Change

著 者：A. Inkeles

譯 者：沙 亦 羣

發行人：熊 嶺

出版者：巨流圖書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華商場五棟2樓5號

電話：三 七 一 〇 三 一 號

郵政劃撥帳戶 1 0 0 2 3 2 號

印刷者：國泰印書館

地址：臺北市南京西路434巷7號

電話：5 1 1 9 7 5 • 5 8 5 0 5 0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月初版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2177號

每冊定價：硬面36元 • 紙面32元

意識形態與社會變遷

Ideology and Social Change //

Alex Inkeles 等著

沙 亦 羣 譯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譯序

這是一本集體創作的書，將正在急遽成長和變遷的美國社會學做一個全盤的介紹，類似這樣的書最近的一本是十多年前（一九五七）由墨頓（R. K. Merton）等人合編的「今日社會學」（*Sociology Today*）。相隔十多年，這其間社會學的發展一日千里，不管是理論的創發或研究方法的革新，都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在這個時候，讀到這麼一本書，確實很快慰。

前書是代表美國社會學會的立場出版的，內容較艱深，而這本書不代表任何一個專門的學會，發行的對象也較普遍，不限於專業的社會學家才看得懂，只要有興趣瞭解現代社會的知識份子都可一讀。

這本書有兩個原始的構想，一是儘可能的把社會學各個主要分枝都包括進去，二是要求各篇文章深入淺出，同時容納不同的理論和觀點，這是目前社會學還未發展到統一階段時所必然有的

現象。

原則上，我同意這本書的主編帕深思 (T. Parsons) 所強調的說法：社會學研究的是社會體系 (social system) 的整合問題，包括阻礙整合，或導致整合失敗的種種問題。因此，社會學包括的範圍相當廣泛，可以從多個角度或層次去討論社會體系的整合問題，它的因素、過程和結果。範圍上也可從家庭，小型團體到若干中間的地方社區、正式組織，再到整個社會結構都在社會學的視野之內。再說，體系也並非一個具體的實物，而是將社會現象當中那些具體的互動行為和社會關係加以抽象化後而得到的一個綜合體。

如此說來，社會體系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它和其他的體系是相輔相成的，最主要的如人格體系 (personality system)、文化體系 (cultural system) 都是和社會體系融合一體的。這個觀點在本書裏相當明顯，第一部份就是從人格和社會結構這個題目開始討論，至於第四部份則幾乎就是談文化體系的問題。

全書共分六部份，茲分別簡介如下：

第一部份分析社會體系的各個成分，包括人格體系、小型團體、正式組織等。

第二部份說明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包括測量的運用和研究法的新趨勢等。

第三部份探討社會體系的各個次級功能體系，包括家庭與親族、教育、經濟、政治，以及階

層結構等。

第四部份申論社會學對文化體系的研究，包括科學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的新近發展。

第五部份從個體社會學 (Microsociology) 的觀點討論若干美國的社會問題，包括偏差行為和犯罪問題，青年與代差問題和種族問題等。

第六部份則從總體社會學 (Macrosociology) 的觀點看現代的社會以及它的變遷，尤其側重在意識形態和社會變遷的關係。

這本原書曾被「美國之言」(Voice of America) 論壇廣播節目拿來當做廣播稿，所以每篇文章都不會太長，這是方便現代忙碌的讀者讀的一個特點。本書同時將每篇的作者都做了簡要而精彩的介紹，並附上照片在每篇之首，這也是以往國內的譯書所沒有的另一特點。提到這些原作者，他們都是目前在美國負有盛名的社會學家，更是所寫的每篇文章那一個領域裏的佼佼者。所以翻譯這種書，內心是很興奮的。

接下來我想提的是這本譯書的書名問題，我挑「意識形態與社會變遷」這篇的篇名做為書名，一方面是為了配合巨流圖書公司這次的出版計劃；另一方面，我還有一點想法，那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怕「變遷」，重要的是要能夠透過對「變遷」的了解，去掌握「變遷」的意義，而使得我們這個社會能導進到一個更理性、更健康的路上去。要有這個觀念，就得在我們的意識形態上

做若干的轉變，轉變的一個動力就是吸收更多新的客觀知識，這本書的這些文章便是很好的來源。唯有吸收新知，才能使我們更容忍，不同的意見，更有魄力去接受「變遷」的考驗。所以，我覺得這個書名確能表達出這本書的精神。這也是我樂意用這個書名的理由所在。

最後我要感謝所有對這本書的出版給予關心和協助的朋友，如果沒有他們，這本書是出不來的。同時，對這本書的任何批評，我都會表示歡迎。

沙 亦 羣

民國六十二年九月於臺北

目錄

譯序

第一部分 社會體系的成分

人格與社會結構

工作與閒暇

小型團體的研究

正式組織的研究

第二部分 研究方法

測量

研究方法的新發展

第三部分 次級功能體系

家庭與親族

目錄

八三

七一

五七

四五

三三

一九

一

一

意識形態與社會變遷

二

教育社會學.....九三

經濟社會學.....一〇五

政治社會學.....一一九

西方社會的階層結構及其流動趨勢.....一三五

第四部分 文化社會學

科學社會學.....一四七

宗教社會學.....一六五

第五部分 社會問題與社會控制

偏差行為及其控制.....一八一

現代社會中的青年問題.....一九一

從社會學透視美國的種族關係.....二〇五

第六部分 現代社會及其變遷

現代社會.....二一九

意識形態與社會變遷.....二三三

人格與社會結構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印克勒斯 (Alex Inkeles)：哈佛大學教授暨哈佛大學國際問題中心的社會文化發展部門的所長。他專長於蘇俄社會的研究和開發中地區的研究。他從康乃爾大學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從哥倫比亞大學得到博士學位。他曾在華盛頓精神病學院和波士頓精神分析研究所研究。亦曾擔任蘇聯難民的會談工作，出版了若干著名的研究，「蘇聯的民意」(Public Opinion in Soviet Russia)，「蘇聯社會」(Soviet Society)，「什麼是社會學」(What is Sociology?)。他曾在史丹福大學的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一年，而且是美國文理學會的會員。

這篇文章的主旨是認為許多問題如果單用社會學的分析是不可能的，要不然也有很大的限制，必須要用心理學的理論和資料，跟社會學的理論和資料相結合，來分析社會現象。事實上，我不敢斷言，不滲雜任何心理學的理論，而僅用社會學的分析是很不可能做到的。很明顯，在使這理論明確和有系統的將心理學的資料帶進社會學的問題，可以增進社會學分析的充分性。

人格的一般性理論

社會結構的研究，所企圖解釋的是一組特殊的制度化安排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的行動結果。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必須正確地評斷這些安排的意義，或它們對人格的影響。所有這些制度化的安排，根本上都是經由個別的人類行動爲媒介表現出來的。因此，任何制度化安排的結果，至少有部分是視其對人格的影響而定的。在評定社會結構的某一面對另一面的影響時，人格體系因此就成了主要的中介變項 (intervening variables) 之一。

對於人格理論的需要，最明顯的或許就是對各種「比率」的研究。這些比率表示出成千成萬的個別決策和行動 (decisions and acts) 的摘要或最終結果；當然數字之大小乃隨不同的社會或文化而異。爲了舉例說明，人格理論在這種比率分析中所能扮演和應該扮演的角色，本文僅以

自殺率和犯罪率來作說明。至於，其它有關比率的問題，分析類型亦同；譬如，現象呈現的次數和居住型態、職業流動的關係。

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在其嚴密的社會學分析中，認定自殺率——特別是「利己式自殺」(egoistic suicide)——決定於特殊社會結構的整合程度 (degree of integration)，這些社會結構包括：教會、家庭、政黨、和國體等。即使是最懷疑涂爾幹分析的人，也不能否定他已顯露出主要的相關模式 (pattern of correlation)。但是有一點是深爲人所懷疑的，就是把社會結構整合狀態轉變爲自殺率的因果關係時，他忽略了自殺的直接因素，諸如自殺者個別的動機和各種想法。涂爾幹最後引進了一個人格的一般理論，作爲介於社會結構整合狀態和自殺率變動（這是他所欲解釋的現象）之間的中介變項。問及自殺的發生，爲何決定於一個社會結構的整合程度時，他的回答歸之於：「人的『心理構造』(psychological constitution) 需要一個超越它的目標」，但這種目標在整合力弱的社會裏較爲缺乏，由於「每個人對他自身和他自己的價值觀念極爲敏感，都希望有他自己獨有的目標，然而當這一個目標不能滿足他時，他對這世界將漠不關心，豪無興趣地苟延殘喘着，從此生存對他來說將變成沒有什麼意義可言。」

本文不擬在此評價涂爾幹最後使用心理學理論是屬適當，或批評他未曾明確地和有系統地引用這個理論於他的社會學分析中。我所想要強調的是，有關自殺研究的發展是不均衡的。涂爾幹

偉大的分析提出了一個如此確定的論證，且又有力的模式，使得近六十年來對於自殺這個現象，無法再有更進一步的進展及認識。好幾代的社會學者都把涂爾幹的「自殺論」當作是社會學分析的標準模式，因此願意接受這種訓練，且能不計代價的爲「純」社會學分析（也就是非心理學的）而奮鬥。

直到最近，亨利和休特二人 (Henry and Short) 出版「自殺和殺人」 (Suicide and Homicide) 一書後，這一重要的領域才有重大的發展。因此，我們實有了解什麼因素使這個研究比涂爾幹的分析更深入的必要。既不是因爲發現許多新的資料，雖然引用不少的新資料；也不是因爲運用了若干新的方法，雖然統計學或其它的方法在涂爾幹時代都未能被有效地運用。亨利和休特二氏的主要成就應是在於有系統地使用心理動力學的理論 (psychodynamic theory) 並與涂爾幹所謂的角色社會整合及社會約束理論 (Durkheim's theory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restraint) 相結合。

亨利和休特將自殺看成是受到約束和挫折之後的一種攻擊性行爲 (act of aggression)，他們假定自殺和殺人都具有這種特徵，雖然這二種反應也就是所要研究的現象（在攻擊性表現的方向並不相同，自殺是對內的，殺人則是對外的攻擊性行爲。在他們的分析中，結合了涂爾幹的情境因素的壓力（也就是受到外在約束的程度）和人格因素的傾向（表現對內或對外的攻擊性）

。亨利和休特的成就就是能夠將自殺和殺人的比率關聯起來，解決涂爾幹分析中的若干矛盾之處，並且與涂爾幹分析的其它部份一致地來解釋一些新的資料，同時建議未來研究的重要趨向。但這個研究的完成，並未減低社會學因素的重要性，也未忽視社會實體中的人格因素。這個小研究可說是個里程碑，指出了今後我們應該走，也將要走的方向。

涂爾幹自殺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事例，爲了強調我的觀點的重要性，尚有賴其他的事例來加以說明。蕭 (Shaw) 在其古典的研究「犯罪區」 (delinquency Areas) 中，提出一個引人注意的解釋。如同涂爾幹的自殺理論，他發現不同的犯罪率決定於社區解組 (community disorganization) 和社會控制力削弱 (weakening of social control) 的程度。(蕭氏的理論還有一個新的要素：犯罪區的概念有一特殊的次級文化 (subculture)，犯罪就是學會這種文化行爲。雖然這種概念也是很重，但在本文的目的中並不是最重要的。) 可惜的是和涂爾幹一樣，蕭氏也是提不出一個可將社區的特質轉變成導致犯罪率個人行動的變化機構來。

在這個研究領域內的進展很慢，直到二十年後，格魯克兄弟 (Gluecks) 的「解決少年犯罪問題」 (Unraveling Juvenile Delinquency) 一書發表，經由一個中介變項——在這些解組條件下產生的各種人格類型——才使得社區解組和犯罪率能夠意義的關連起來。格魯克二氏不朽的研究中，使我們能夠了解爲何在犯罪區中先前所提到的社會條件 (即社區解組的程度) 會產生

犯罪行為。他們顯示了在這種社會條件下的人格及行為傾向於犯罪行為。格魯克兄弟也使我們了解蕭氏所不能解釋的：為何在犯罪的次級文化中，僅有少數人確實學得這種文化的行為。

然而這一分析並未減低犯罪次級文化或犯罪區實體特質的重要性；這些特質包括：一個工業過渡地區的物質腐敗，少數民族難以應付的形像，高的酗酒和犯罪率 and 嚴重的破裂家庭的生活。由於把此情境中的社會的與心理動力的二個因素並列整合，它確實大量地增加了我們對於此現象的了解。也確實增加了不少我們預測和控制這現象的能力。

人格與社會流動

人格的一般理論除了在解釋社會行動的層次上（可用人口比率來表達）擔負重要的角色外，在分析主要的社會流動或社會過程（social movements or processes）中也是很重要的。

韋伯（Max Weber）也許是研究大規模社會過程中最偉大的社會學學者，他富有心理學的敏銳知識。誠然，在許多方面他分析基督新教對資本主義的影響，是人格類型的一個詳細陳述；這些人格類型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不過，在他的基本問題——新教的經濟倫理中的什麼因素激勵了資本主義——並不特別需要一個人格的一般理論的介入。人格類型至少是隱含在宗教

倫理中，主要的問題是在將這宗教倫理轉變為經濟實體中之行動。

在最近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影響的許多研究當中，弗洛姆（Erich Fromm）的研究是一個很傑出的例子，他應用人格的一般理論來解釋，由一個特殊社會組織的型式所產生的社會流動。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書中，他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即作為一個社會經濟體系的資本主義對「人」（由人格的一般理論所表現的）有怎樣的影響。

弗洛姆分析的架構是個概括性的問題：「心理因素在社會過程中扮演的行動驅迫力的角色。」他探究這個問題主要是涉及二個普遍需要的影響；與他人聯繫的需要和自由或自主的需要「這些需要的根源並不在於人體成長的過程，而是在人類生活方式的本質。」他說：「避免孤單的需要是最重要的。與其它的價值、符號、類型缺少關連，我們可稱之為精神上的孤單（Moral aloneness）：精神孤單和身體物質上的孤單同樣是難以忍受的。或者可以這樣說，在精神上孤單的，在身體物質上的孤單便一定不可忍受。像這樣的人是最可怕的了。」自由的品質很少被精確地界定過，但它似乎表示自由是從本能或避免個體化（prevent individuation）的約束中解脫而來，以滿足天賦的生長潛能。

假設這兩種人類普遍的需要成立之後，弗洛姆主張所有人類歷史的特徵是「衝突與鬭爭」（Conflict and strife），因為……

「導向個體化趨勢的每一個步驟中，人們都將面臨新的不安全的威脅。當一切主要的聯繫被切斷，就再也沒有補償的可能。一旦人類個體化過程中所依賴的經濟、社會、政治條件，不再能做為實現個體化的基礎，……同時人們也喪失了給他們安全感的那些聯繫時，這種種失調將使得「自由」成為一個不堪忍受的負擔。……於是將產生一種逃避自由的強勁趨勢，而極欲順服於某人或與其它的人發生關係，這時即使被剝奪了個人自由，也希望加入那個能解除個人不確定狀況的社會關係中去。」

在這個架構裏，弗洛姆描述了現代人的歷史，從中世紀經宗教改革時代（reformation），到現代民主社會的建立以及與它互補的法西斯主義的變形——現代的極權主義（modern totalitarianism）。他的研究是極富野心的，因為他企圖以一個既定的理論，使它適用於若干國家的人類歷史，他有歷史學家更進一步確定的優點，他的理論和他所選擇的事是一致和諧的。然而弗洛姆對於社會的歷史和我們對現代人類的了解已增加了某些東西，誠然，「逃避自由」這本書可能是廿世紀最傑出的社會科學著作之一，但是我在此介紹它的目的，並不在支持它的論題。弗洛姆這個分析的重要性是在於他明確地使用人格的理論作為一個獨立的因素，來分析社會變遷的連續過程。

如上所述，弗洛姆的一般化的理論指出人有二種需要：高度的與他人發生關係和從預防個體